编者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发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系统部署，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根本遵循。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聚焦乡村全面振兴重点难点，本刊特推出专题研究，刊发三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以理论创新回应实践需求，以深度调研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嵌入与优势互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的实践路径》以“乡村金融超市”为典型案例，提出“服务嵌入+优势互构”机制，阐明党建引领如何通过服务下沉、要素集成、主体协同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健全资源集成、主体动员、利益联结三大机制，有效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同构异效：乡村全面振兴中政经融合型集体的绩效分化及其成因》聚焦政经融合型村集体“同构异效”现象，通过多案例比较揭示组织结构趋同背景下，政治引领、村庄经营、治理三维能力差异是绩效分化的核心成因，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提升集体组织能力而非单纯变革组织形式。《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立足地域再生理论，构建“主体—环境—产业”三位一体框架，系统阐释乡村片区组团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直面联动不足、统合不畅、赋能不够等现实困境，提出党建引领、空间正义、统分结合的实践路径，为片区化协同发展提供完整方案。

本组专题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理论根基扎实、问题导向鲜明、实践指向明确，既剖析深层机理，又提炼可行路径，充分展现学术研究服务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期望三篇文章能为各地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强化村集体组织能力、推进片区组团发展提供学术借鉴与实践启示，助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何得桂，张新雨．服务嵌入与优势互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的实践路径［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4）：22-32.
He Degui，Zhang Xinyu. Service embedding and advantage co-construction： a practical path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4）：22-32.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4.003

服务嵌入与优势互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的实践路径

何得桂，张新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乡村产业振兴关乎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效。基于组织协同和优势视角，案例研究发现，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离不开服务嵌入和优势互构的积极组织行为。依托党建势能，基层政府治理拓宽了多主体参与通道，以服务嵌入的方式推进优势互构行动。为推进乡村产业配套公共服务可及性，优势治理主要采取协同治理方式，在特定时空维度中推进组织协同，进而驱动乡村产业发展。遵循资源集成机制、主体动员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的服务嵌入和优势互构相辅相成，实践中注重从资源维度、主体维度、关系维度激活产业振兴动能，从而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共同体，并呈现出组织协同的治理方式。

关键词：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嵌入；优势互构；组织协同；产业发展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4-0022-11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产业兴旺关系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1]”。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党建引领、公共服务创新以及乡村社会动能激发。基于农村

收稿日期：2026-02-05 **修回日期：**2026-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发展型治理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研究”（22AZZ006）
作者简介：何得桂，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地方治理创新，养老服务。

“空心化”及国家对农民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的背景[2]，国家大都依托政策、技术、资金、人员等要素下沉发展乡村产业。但是乡村产业仍面临普惠性金融政策落地难、对优质要素和发展成果的吸纳运用能力偏弱以及内生自主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产业发展议题受到广泛关注。

一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地区主要依赖外在力量（如人才、资金、技术和制度等）要素援助[3]，表现为外生发展模式。但是它通常忽视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和区域发展的多样性。既有研究逐渐转向内源发展模式，强调乡村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研究认为，乡村发展动力来自其内部，突出发展的内源性潜力和可持续性，注重地方民众的自主参与，进而形成区域认同[4]。同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离不开借助外部资源，外部力量和乡村协同有助于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二是探讨党建引领机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最为显著的制度优势。通过赋予主体权力与能力，激发产业主体发展的主动性，从而增强党建引领力。党建势能可进一步与政治势能结合，党建引领各发展主体，优化、整合和重塑发展资源[5]。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除了具有高效率之外，还需具备可持续性[6]。三是关注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基于内外部力量互动，有学者提出“三阶嵌入式”新内源发展路径，以内外协同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7]。也有研究基于内外链接构建整体系统，以内外系统互促推动主体、资源和空间的互动融合[8]。从发展主体看，乡村产业发展涉及政府、新乡贤、产业带头人、企业、村民等主体。地方政府以差异化的嵌入工具通过差序嵌入和治理赋权来缓解纵向科层秩序带来的张力，在乡村产业振兴中扮演领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9]。只有突出发展主体性，才能更好地构建合作网络治理。

既有研究虽进展显著，但还存在不足：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及其内在机制，而探讨政府服务嵌入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较少；与此同时，现有分析视角大都涉及新内生发展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产业主体优势及其特征关注有所不足。既有研究多探讨以主体互动协同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但探寻组织协同推动产业发展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鉴于此，本文基于陕西省安康市B县“乡村金融超市”实践，透视乡村产业发展过程，呈现政府服务嵌入、主体间优势互构的组织协同形式，以积极回应乡村产业可持续性，进而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服务嵌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嵌入性理论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关联

人类经济是嵌入并纠缠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10]。20世纪80年代，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强调经济行为受其所在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并将其区分为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11]。在社会治理领域，我国学者认为嵌入是指在一定情境下某个事物或系统介入其他事物与系统之中的现象，强调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耦合[12]。乡村产业发展涉及多方要素的深度嵌入和合作互动。传统农村具有封闭性、公共性等重要特征。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日益开放且流动性不断增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和产业发育稀缺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很难通过内部直接生成[13]，往往需要外部力量嵌入作为补充。乡村场域产业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政策支持和政府服务。治理领域的嵌入理论通常被延展为政治嵌入、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资本嵌入。它强调将外部的发展要素深度地嵌入于乡村发展领域并注重培养乡村内源发展能力。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职能处于“公共服务职能优先”阶段[14]，以政策下乡和资源下沉驱动乡村产业发展。政府治理注重以服务者角色为民造福，主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基于嵌入理论，政府与乡村产业发展目前处于服务嵌入的互动过程。

（二）服务嵌入的情境分析

服务嵌入通常发生在乡村产业发展能力与农民农村富裕要求不匹配状况，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制度机制、责任感等均影响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及水平。基于内外部情境，政府服务通过积极赋能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实践。

1. 外部情境的积极驱动

县级政府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承担着引导产业发展、推动产业有效运行的职能。关乎农民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安定有序的乡村产业振兴，要将其放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局予以审视。曾是陕西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B县，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9万人，贫困村74个（其中深度贫困村26个）；2019年12月，当地74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县级政府要促进乡村产业有效发展，就必须介入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基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治理机制，县级政府拥有产业发展资金整合权。基于区域竞争的横向压力，B县注重优化基层治理行为以及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做好过渡期内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信贷投放和保险保障力度，助力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15]。”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及其资金有效使用离不开基层治理有效。调研发现，B县产业发展过程存在资金筹措难、抵押担保贷款难等问题，当地普通民众拥有产业发展资金较少，同时也相对缺乏信息获取渠道以及管理能力。国家政策导向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需求成为当地服务嵌入的重要条件。

2. 内部情境的整合推动

服务嵌入的内部情境分为内部动力和内部阻滞。就前者而言，政府治理具有使命性和人民性。基于中国场景的政府展现出“积极治理”行为特征，主动承担公共事务、积极回应各方挑战。面临产业发展资金筹措难、抵押担保贷款难的问题，B县注重强化党组织对农村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它于2021年就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112个村（社区）设立“乡村金融超市”，及时搭建“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其人民性的核心体现在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方面，B县重视从群众中来，掌握和回应民众的急难愁盼；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组织深入于基层群众，把政府服务落实到农村金融领域，从而解决乡村产业发展难题。当地以治理责任感和人民性更好地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的阻滞因素主要涉及制度建设以及机制优化问题。一是乡村产业发展薄弱环节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在时间维度上，产业发展前期，B县木瓜、茶叶等产业总体处于初加工阶段，农户农产品增值能力较薄弱，产业资金整合环节也缺乏高效的制度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发展。二是乡村组织内部制度建设较弱。依赖于“熟人社会”自发形成的乡村非正式制度往往具有“防御性”[16]。这种制度特点不利于生产要素引入和产业发展，乡村制度与基层政府政策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协同。三是乡村产业发展相对缺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优势的机制。虽然国家力量深度渗入乡村社会，但产业发展的联农带农效果偏弱，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导致制度优势难以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效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内部阻滞共同驱动服务嵌入的生成。

（三）服务嵌入乡村产业发展过程的探讨

“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基层社会经历了由管理到服务、由控制到互动、由单向治理到官民共治的运行逻辑变化[17]。基层与地方政府注重以公共服务代替行政管理来发展乡村产业，以服务嵌入促进国家、社会和民众的良性互动，进而驱动乡村产业内生发展。

1. 基于党建引领强化积极治理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中发挥主心骨作用。基层政府秉持积极治理理念，注重释放政治势能和党建势能以统合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兴旺。其一，基层政府以积极治理促进产业发展。积极治理强调政府为民造福的治理理念，要求政府主动识别公共问题、分析原因，优化调配各方主体以探寻务实管用的发展路径。基层政府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责任人。B县产业实践中遭遇农村产业发展资金不足问题，通过党建引领构建三级共建模式①推动资金高效利用，以积极治理助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其二，以党领共治促进产业基础夯实。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发展最重要的引领者，它渗透乡村社会的同时嵌入产业发展链条，构建党员干部“三位一体”参与体

① “三级共建模式”指党委合作共建、支部协同共建、党员互助共建。

系[①]。B县以党员和党组织嵌入乡村产业融资环节，从而强化服务嵌入产业，密切联系有生产需求的社会民众，通过执政党组织动员社会民众，进而筑牢产业发展基础。其三，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为基本抓手。在产业发展的前期，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势能往往尚未充分地转化为发展效能、治理效能。基于积极治理突出党建引领功能，B县注重以党建势能彰显服务功能，通过创新“党建引领＋金融先锋”发展模式，将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当地基于属地管理，把村级治理单元与金融信贷机构相融合，特别是通过属性治理[18]强化组织动员功能，进而促进资金要素跨地域稳定运行和产业融资安全。

2. 基于平台共建发挥媒介功能

作为空间载体的多维公共平台可以对多元公共产品以及推进公共服务协作创新[19]，搭建公共金融服务平台有助于链接群众及其他各方力量。政府组织注重服务下乡，并以金融平台嵌入乡村产业发展实践，进而推进多元共建。其一，搭建高效治理平台。政府不仅拥有控制平台的权力，还能创建公共平台[20]。依托122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B县建立“乡村金融超市”平台，从而为群众提供可及且便捷的金融服务。其二，推动多元主体的积极共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金融服务离不开基层党组织、涉农银行、乡村精英、基层党组织、群众等主体的深度参与和协同共建。B县组织党员干部参与信贷服务工作，建强金融链条上的党组织，并与金融机构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组织动员银农对接。同时还建立产业发展服务队提供生产经营指导服务。基于制度性平台搭建，以组织多元主体互动进而使乡村产业充满活力。其三，注重发挥基层组织的媒介功能。乡村金融借贷要注重解决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问题。基于地缘优势，村委会及村党支部负责人既熟悉借贷人员情况及经济发展能力，同时也了解群众的发展难题及现实需求。基于村（社区）层面设置“乡村金融超市”，有助于作为金融协理员的村党支部书记把政府服务和群众需求更好地联结、互构和融合。这既能确保村委会更好地收集民众发展需求，还能以村级组织为媒介为社会民众提供可及性的金融资源。通过平台建设嵌入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政府组织可依托媒介动员相关主体，进而激活“金融超市”平台功能。

3. 基于要素优化驱动变现能力

乡村发展要素难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基于农村产业发展场域，服务嵌入更强调基层政府将农村稀缺要素与本土要素适配，主要表现为政府引导特定治理要素流入村庄，并优化组合。其一，引导农商银行资金要素流入。2021年以前B县遭遇农村基层金融机构网点少、放贷成本高、风险识别难的难题。通过积极引入农商银行信贷资金，进而重构和激活了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组织体系。政府在农村信贷中引导资金要素流入，使农村信贷资金更加灵活可及，进而激活其他产业发展要素。其二，推动产业发展要素积聚优化。B县2022年5月7日出台农商银行“乡村金融超市”工作的推进方案，加强政银合作。在农村场域建设融资平台，注重健全三级组织体系[②]。村委会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信贷数据，农商银行为村民定制六大特色信贷产品[③]，进而吸引农村产业人才投资贷款。服务嵌入中资金要素被激活，推动了组织、制度、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聚集优化。其三，增强发展要素的变现能力。通过金融服务更好地把制度势能转变为产业发展及其治理效能，把村民贷款数据变为发展需求和服务目标，有效变现资金要素，从而推进当地村民的共同富裕。2021年来，B县以金融服务支持12 897户脱贫农户做到产业增收，助力发展壮大市级以上龙头企业48家、县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175个，发展农民合作社652个以及家庭农场466个，乡村产业逐渐蓬勃发展。

4. 基于服务提升增强产业内生动力

随着农村生活、生产和交往日益社会化，其需求及由需求产生的事务不断增多且具有公共性，这需要通过公共机构办理[21]。与此同时，基

① 党员干部“三位一体”参与体系是指由农村党支部书记担任“金融协理员”、县农商行党员业务骨干担任“金融联络员”以及选聘党员商户为“金融服务员”的“三位一体”参与体系。

② 三级组织体系是指建立“县级谋划指导—镇级工作协同—村级业务协作”的组织体系。

③ 六大信贷产品是指“党员先锋贷”“道德模范贷”“返乡创业贷”“乡土人才贷”“龙头企业贷”“集体经济贷”。

层政府的办事逻辑逐步从“管理”转向“服务”，更加突出人本主义的服务取向。一是政府办事从“管理”转向“服务”。积极担任人民公仆角色的B县，不再是强制性规定借贷任务的管理者，而是注重积极化解产业发展和金融服务过程中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它把人民群众作为服务对象，把政府主体变为群众主体，彰显了政府为民造福的积极取向。二是积极推进全过程及精细化服务。通过组建“三员”服务队伍①及产业发展服务队，B县以乡村金融超市深化金融服务、简化流程，并注重服务的惠民性和多元化。根据群众发展需求，B县推出六大特色信贷产品，同时还结合产业发展新需求不断丰富更新特色信贷产品。它还依托“助农E终端”设备为民众提供多项生活服务，进而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边界。三是以服务嵌入推动产业发展能力增强。以“服务下乡”促进群众共享社会建设成果，增强共同发展意识。通过构建“政府主导、银行联动、支部推进、党员带头、农户参与”的“五位一体”评级授信机制，B县对产业发展成效明显的党员群众、市场主体和村（社区）按照5%～20%提高授信额度、10%～20%降低贷款利率并及时予以表彰奖励，进而增强群众发展产业动能。截至2024年9月末，B县已建立信用村36个、信用镇3个，累计授信农户10 253户，涉及金额为4.86亿元；以特色信贷产品为重要载体，累计授信特色信贷产品7205户，发放贷款11.46亿元，使他们共享公共服务成果。

三、优势互构：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优势治理是治理系统中政府和民众等各主体根据各自的优势，以最合适的身份和最优质的状态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和协同治理[22]。基于优势视角，不同主体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积极探寻产业发展要素的优势组合。

（一）以党建势能彰显条抓块统的制度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国情，其“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抓块统”的治理格局，促进了政府、社会和民众之间的联结，有助于国家意志的上传下达。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党建工作与城乡治理日益融合，重视党组织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以及整合优化，进而释放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保障国家善治和社会安定有序是国家的重要职能。有研究认为，在条块并存的政府结构中，政府治理难免产生权责倒挂、协调障碍、治理分立、管理梗阻等问题[23]。党组织以其灵活性、高效性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党员干部以及基层组织，推动“条条”“块块”之间的协同，进而更好发挥产业发展的服务功能。在产业发展初期，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乃至治理优势需要充分地转化为治理动能及发展效能，其主要在于协同、整合、优化资源要素，进而释放党建势能。

为保障乡村金融资金安全以及产业发展可持续，B县把党建工作与金融服务紧密结合，筑牢产业发展的治理基础和组织基础。该县以乡村金融超市为载体，健全三级组织体系以及三级共建模式。通过整合县域资源、对接资金融通，从而推动各镇党委与金融机构党组织、各村（社区）党支部与驻镇金融机构网点党支部共建共创。案例实践以政党下乡、服务下乡的方式，积极构建党员干部“三位一体”参与体系，进而为乡村产业落地和发展提供金融保障，也促进了各主体的联动治理与协同行为。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党建势能，推进县域资金、资源要素的积极调配及优化组合。

（二）以优势治理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优势

村民自治组织关乎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实现程度。发展农业要“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24]。农民被赋予政治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组织生产、参与产业发展。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仍面临村民参与偏弱的现象。村民自治组织虽受制于资源匮乏以及治理碎片化制约，但拥有制度合法性，宗族网络、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优势，能长期维系乡村社会秩序。产业发展的资源

① “三员服务队伍”是指由122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金融协理员”、选派55名县农商行党员业务骨干担任“金融联络员”以及选聘100余名道德品质好、诚信经营的党员商户担任“金融服务员”。

信息匹配环节离不开村民自治组织，后者以自治优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治理优势，B县科学布局金融服务站点，在11个镇设置18个营业网点，在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均建立“乡村金融超市”。通过构建“镇有网点、村有站点”的立体式、联动型的金融服务体系，进而做好产业发展贷款服务。金融协理人员凭借“地熟人熟”的优势，负责审核信贷主体的资金申请，并在服务点递交相关资料。群众自治组织因贴近民众、联系紧密，能积极回应并有效破解乡村产业发展难题。当地还通过构建评级授信机制，把深化新民风建设和评定“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与授信等级挂钩，定期评选“诚实守信光荣户”，使乡村组织自治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耦合，彰显了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优势。

（三）以共同缔造的方略发挥各主体要素优势

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各发展主体的联结，需充分发挥相关主体的独特优势，以形成较有活力的产业共同体。一是重视产业发展的共同缔造方略。产业发展涉及不同主体、不同阶段，基于优势治理视角产业发展共同体离不开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缔造方略。在资金整合环节共同缔造体现比较明显，各主体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可发挥相应的治理优势。在案例实践中注重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优势、农商银行的经济优势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优势，进而依托“乡村金融超市”，组织县镇村产业发展服务队提供生产经营服务。二是突出各发展主体的资源要素优势。针对村级组织产业发展的统筹能力较弱的情况，党组织和政府将农商银行动员到产业发展之中，后者以资金要素撬动产业发展。当地农商银行与县委组织部签订10亿元政银合作框架协议，设立100万元专项工作经费，积极组织召开银农对接会、政银企洽谈会等。这推动形成了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对接、社会组织有效配合、村民有序参与的积极态势，进而避免和减少银行放贷难、村民借贷难的窘境。三是以共同缔造方略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基于壮大乡村产业以及促进民众增收的共同目标，产业发展共同体是党组织领导下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涉农企业和村民等主体相互合作、联合发展的组织形态。作为方法论的共同缔造，强调各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和良性互动，有效将产业发展的各主体更好地统一于发展共同体。当地在积极动员发展主体的同时，还注重运用典型示范方法。基于党领共治和组织动员，村级组织通过宣传和示范激发村民积极申报，从而促进生产合作化。在产业集资环节，各主体积极发挥优势、互动合作，进而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

（四）以党的群众路线践行释放民众的主体优势

组织发展除了重视同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关系之外，还要解决内生发展动能问题，这是维持组织活力经久不衰的基础[25]。激活内生动能关乎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人民群众是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动员对象。在资源禀赋普通、产业基础薄弱的乡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有利于整合利用资源优势。它通过各相关主体的抱团发展以激发产业内生动能，并基于主体之间优势互补形成良好发展关系。而基于党的群众路线，作为领导乡村产业发展核心的党组织注重组织动员社会民众，始终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而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乡村产业发展强调组织动员人民群众，以及在产业后期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优势。

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B县“乡村金融超市”通过实践主动对接和动员农村党员、脱贫群众、普通农户、乡土人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园区、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从而为它们提供金融贷款服务。截至2025年1月，B县农商银行已向6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累计发放贷款3655万元。例如，宋家镇培育壮大市场主体8家，家庭农场2个，种植养殖大户9户，经济作物园区种植面积超366.67公顷（5500亩）。通过积极动员群众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不仅满足了产业资金需求，也挖掘了群众的主体优势，进而培育了其内生动能。

乡村产业发展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优势不同。基层党组织以其政治优势领导产业要素集聚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发挥其主动优势联系群众而以及链接功能匹配借贷资金供需信息，以农商银行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灵活及时地提供发展要素，人

民群众则居于产业发展的主体地位优势。既要依托不同主体优势来发展产业，也要注重不同优势的合作和互动（图 1）。在空间维度上，优势互补有利于摆脱属地化管理的局限性，依托以“乡村金融超市”为载体聚集发展要素，进而破解农村产业信贷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资源配置效率能偏低问题。在时间维度上，不同的治理优势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居于不同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优势相互补充，进而形成产业发展共同体。基于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与优势互构，以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富裕为目标，致力于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组织搭线、社会组织有效配合以及社会民众有序参与的良性发展局面，从而有助于形成产业主体间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优势结构和治理生态，增强了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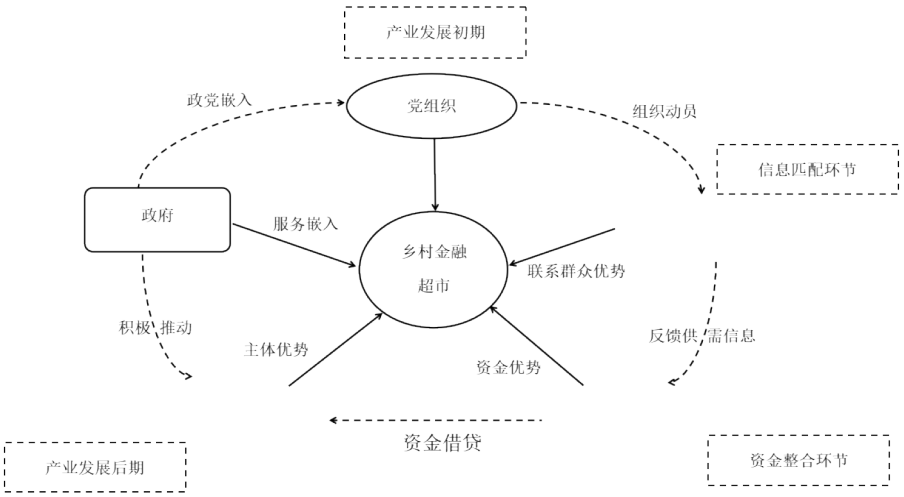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发展各阶段不同主体的优势集聚互构过程

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实践机制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离不开治理机制的积极构建，循序渐进的产业发展机制是党建势能转化为实际效能、公共服务为民利民、推动治理优势转化的重要环节。案例实践表明，政府以服务嵌入调动资源集成统合，以优势融合构建主体间的利益联结，二者是组织协同的重要实践形式。这有助于推动内源式主体动员，进而健全产业发展资源集成机制、主体动员机制及利益联结机制，最终将组织协同的服务供给更好地转化为产业治理效能。

（一）资源集成机制：以党建优势促进发展要素统合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鲜明特征，党建优势主要体现为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动员以及资源要素的系统集成。一是党领共治的参与式治理。乡村产业发展涉及基层政府、村集体、村民、涉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案例实践中，基于“党委合作、支部协同、党员互助”三级共建模式运行，发挥党组织左右协同和多维赋能的功能，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中实现与多元参与主体积极互动。二是党组织集成统合产业发展资源。B 县构建和完善“县级谋划指导—镇级工作协同—村级业务协作”的联动式组织体系。基于三级共建模式，党组织统合政府、民众等治理主体，并依托党组织这一核心力量，促进县域资源要素和各主体发展资源的整合利用。与此同时，将党支部建在产业发展与推动金融服务链上，党组织建设与县、镇、村产业协调布局，注重统合并精准释放产业发展资金效能。三是以主体优势互构和发展要素融合驱动资源集成。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是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党建势能推动各主体优势互构与良性互动。村委会具有需求发现优势，精准对接农商银行的涉农资金，从而确保信贷资金准确投入和高效能利用。优势是各主体的重要特征，通过多元主体联

动治理推进优势互构，使主体优势与发展要素深度融合，B县整合县域涉农要素发展乡村产业，在村（社区）形成“收集信息—借贷资金—发展产业”的要素融合中心，从而有效促进产业发展资源集成。

（二）主体动员机制：以党领共治激活乡村社会活力

为激活乡村社会发展活力，现代政府注重积极动员并增强发展主体的内生动能。主体动员并非简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而是重视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及能力培育。在产业内生发展较弱时及时嵌入政府服务，注重以优势互构激发主体能力生成。其一，以党领共治深化主体动员。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处于相对分散状态[26]。为推动产业合作化以及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适应性[27]和人民性领导动员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产业实践。产业发展主体紧紧围绕在党组织周围，党领共治彰显了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推动共同参与、实现共同治理方面的核心作用，进而在产业发展中表现出主体的发展能力。其二，以主体动员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政治一体化下的乡村社会拥有良好秩序，但随着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与民众主体性彰显，处于基层的民众与国家的联系仍然不够密切，乡村社会的活力有待加强。与此同时，乡村产业资源、产业主体的发展能力仍显不足。案例表明，产业主体的动员既强调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及增强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互动性，也注重提高群众参与发展产业能力，进而建设平安祥和且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其三，组织动员多元主体致力于发展可持续的产业共同体，乡村社会产业发展离不开党组织领导。主体动员是政府服务嵌入和主体优势互构的目标和结果。基于政府服务提升，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将群众有效组织到产业发展实践之中。产业发展后期更侧重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优势，注重社会民众的深度参与，进而增强内生动能，最终形成具有人民性、竞争性和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共同体。

（三）利益联结机制：以精细服务提高产业发展效能

利益联结机制的外在表现为联结模式，内在机理为利益分配规则，不同模式构成不同机制[28]。服务嵌入的联结模式与优势互构的利益分配规则协同驱动生成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一是产业发展的主体联结。政府通过提供精细化服务破解产业发展资金难题。在乡村产业发展初期、信息匹配环节、资金整合环节和产业发展后期的不同阶段，既要政府组织的引导发展，也离不开与产业发展主体、村委会、新型经营主体等主体的紧密联结，从而激发各方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多元主体参与产业发展拥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它既是产业发展的资源，也是各主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利益。基于服务嵌入产业发展，使各主体能有效利用相应发展资源，形成较为紧密且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以优势互构集聚发展动能，从而驱动产业发展。三是以精细化服务撬动主体间利益联结。现代政府注重精细化服务，通过党组织动员，实现与村委会、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外的在联结。与此同时，政府深化精细服务的目的是依法保护和发展人民利益。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依托服务提升从而引导不同发展主体参与，发挥不同主体的治理优势，从而构建和完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规则。案例实践通过保护和发展各主体的资源要素，以不同阶段各主体的优势互构形塑产业发展格局。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发展主体利益联结，也强化了产业发展效能，最终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乃至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基层治理场域，资源集成机制有助于克服属地化管理的局限性，以属性治理[29]和党建势能推进参与主体和资源整合集成于乡村社会。利益联结机制把各主体统一到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以各自要素优势和核心利益参与产业发展实践，形成产业发展的优势互构系统。主体动员机制主要强调政府服务嵌入乡村中激发社会民众的参与积极性以及主动性，通过优势互构形成产业发展共同体，注重培育和增强广大民众和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资源集成机制提供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关系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主体动员机制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秩序与效益，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利益联结机制强化产业发展可持续性，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们三者相互作用、动态演进，从资源维度、关系维度、主体维度协同促进乡村产业有效发展（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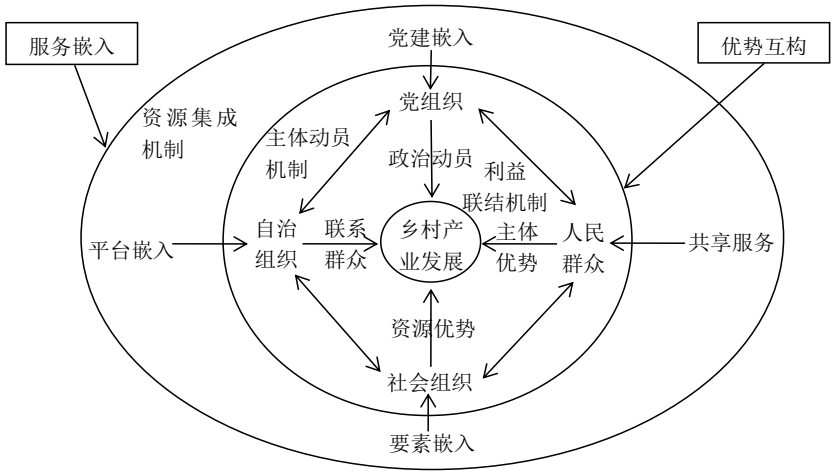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产业有效发展的实践机制

五、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在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离不开公共服务和组织协同。在空间维度上现代政府以服务嵌入统合发展主体，基于优势视角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各参与主体独特优势的发挥；在时间维度上需优化配置治理优势。通过分析案例实践，本文主要结论有：

一是服务嵌入彰显了基层产业发展的善治导向，也是赋能型治理的重要体现。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把治理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服务效能关乎产业发展的成色。政府服务以党建嵌入、平台嵌入、引导要素流入等方式深深地嵌入于乡村产业发展实践。现代政府以精细服务促进国家、社会和民众的良性互动及互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转向“办事”逻辑。与此同时，服务嵌入将党组织、村委会、涉农银行、民众等主体向乡村场域集聚，不仅强化了各主体自身的活力和能力，更是将它们统合到产业发展共同体，进而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是优势互构突出乡村产业发展过程及其行为的多维互动效能，深化了优势治理。各主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发挥相应的治理优势。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共同发力，从而促进多维互动治理。通过互构治理优势推进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动态维度，不同优势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信息匹配环节、资金整合环节、产业发展后期所拥有的主体地位有所不同，它有利于突破行政区划边界来灵活配置资源，进行优势互构，进而形成互补互融的优势结构以建设产业发展共同体。

三是健全的产业发展机制关乎乡村产业兴旺的成色，也是基层治理有效的重要支撑。基于优势治理视野和系统思维，本文所探讨的资源集成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主体动员机制，既是中国式国家制度显著优势的彰显，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体现。资源集成机制有效统合了发展力量，促进发展要素集聚；主体动员机制以党领共治的方式推进主体充分参与产业发展，有利于培育和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主体之间优势互构，从而促进优势的巩固发展。它们三者在案例实践的服务嵌入和优势互构过程中生成，相互作用并协同促进产业有效发展。

四是组织协同是新时代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有效实现方式。服务嵌入和优势互构是乡村产业振兴中组织协同的生动体现。通过以服务嵌入调动政府、社会、民众协同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发挥乡村自身独特优势，突出基层治理中政府办事逻辑的积极转向。基于主体优势视角和时空维度，不同组织积极参与产业发展，协同构成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角色。组织协同参与形成优势结构，在功能上实现整体发展效能大于各部分优势之和，从而改善之前产业发展较弱的局面。组织协同过程的服务嵌入是先导，以服务嵌入激活各组织优势。优势互构发生在服务嵌入之后，以组织间优势协同推进优势集聚互构，进而

整合各发展要素并激发基层主体发展动能。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离不开务实有用的公共服务，优势视角有助于解释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及行为。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以组织协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机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增强乡村发展内生性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该主题仍需深化。要结合实践发展，积极探索脱贫地区基于组织协同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理，从而为面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优势互构是回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积极行为，其以组织协同方式动员乡村新型发展主体，重视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解决产业发展问题。此外，要积极探索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中组织协同的有效实现方式，推进多元主体的互动治理，进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6-02-04(01).

[2] 何得桂，徐榕. 政策变现的乡土逻辑：基于“有参与无合作”现象的分析及超越[J]. 中国农村观察，2020（5）：24-39.

[3]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 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61-68.

[4] 方劲. 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34.

[5] 何得桂，刘翀. 党建势能：基层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以陕西H县党建“三联”促发展为例[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2）：12-23.

[6] 曾薇. 在地化调适：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创新[J]. 中国农村观察，2023（6）：103-123.

[7] 仝志辉，杨润峰，罗建章. 乡村特色产业的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以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23（8）：31-43.

[8] 黄建红，刘世杰. 互促共振：“内外链接”如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基于新内源发展理论的多案例研究[J]. 世界农业，2025（1）：56-66.

[9] 毛春梅，姚清. 地方政府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差序嵌入与治理赋权——基于霍山石斛产业的历时性观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2-103.

[10]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

[11] Granovetter M S.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4（19）：481-510.

[12] 李俏，肖洁，赵天予. 社会组织如何嵌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基于重庆大足的案例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3-62.

[13] 罗明忠，杨怡. 制度嵌入、企业家精神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广东省梅州市“产业村长”制度的剖析[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68-180.

[14] 高小平. 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兼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比较分析》的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24（3）：63-71.

[1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 (2023-10-11)[2025-07-11].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0/content_6908495.htm.

[16] 高帆，李蔚. 农村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如何影响了农民合作组织[J]. 学术月刊，2021（11）：60-76.

[17] 俞可平. 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8-59.

[18] 何得桂，韩雪. 属性治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2022（5）：69-78.

[19] 詹绍文，刘家明. 平台型治理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主要范畴与价值意蕴[J]. 行政论坛，2025（2）：69-80.

[20] 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触碰新兴技术的化身[M]. 程水英，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73.

[21] 徐勇，陈军亚，杨红新. 重构基层：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传统超越与现代转向——以现代化为考察视野[J]. 河北学刊，2025（3）：1-10.

[22] 张大维. 优势治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与乡村振兴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2018（11）：66-72.

[23] 邱实. 职责聚合：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的优化创新[J]. 理论月刊，2022（12）：35-43.

[24] 新华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EB/OL]. (2009-10-13)[2025-07-15]. https://www.gov.cn/test/2009-10/13/content_1437675.htm.

[25] 曹冬松，方雷. 资源禀赋、内生动能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逻辑——基于闽鲁乡村地区的多案例比较[J]. 农业经济问题，2025（4）：92-108.

[26] 许中缘，肖佳欣，夏沁. 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集体

经济利益联结机制重构：实践模式、运行机理与保障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5（2）：24-39.
[27] 项继权. 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9.
[28] [德]韩博天. 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M]. 石磊，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3.
[29] 何得桂，韩雪. 属性治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2022（5）：69-78.

Service embedding and advantage co-construction： a practical path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e Degui，Zhang Xin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crucial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e case study of "Rural Financial Supermarket" found that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industrie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active governance behaviors of service embedding and advantage co-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 for rural industries，the advantage governance mainly adopt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pecific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thereby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service embedding mechanism organizes and mobilizes multiple entities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government power. The advantage co-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combines different governance advantage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entities，promoting the endogenous gene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process and behaviors of service embedding and advantage co-construc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mechanism，the entity mobilization mechanism，and the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ctivating the momentum for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sources，entities，and relationships，so as to form a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Keywords：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Service embedding；Advantage co-construction；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munity